

CHONGSU YU SIKAO

重塑与思考

YIJUWUYINIANQIANHOU GAOXIAO ZHISHIFENZI SIXIANGGAIZAOYUNDONG YANJIU
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

崔晓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重塑与思考

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

崔晓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崔晓麟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11
ISBN 7—80199—365—9

I. 重… II. 崔… III. 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料—研究—中国 IV. ①D663.5 ②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144 号

书 名: 重 塑 与 思 考

——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研究

编 著:崔晓麟

责任编辑:贾京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8.625

版 次:200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365—9/K·294

定 价:35.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对 1951 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与分析。一方面通过透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并通过分析从国统区过来的高校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等不利于高等教育改革、不利于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中的领导地位的思想状况，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发动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分析高校知识分子主动认同新政权，主动要求改造思想的心态以说明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史论结合，从纵、横两维视角对 1951 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内容、特点及成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经验教训正反两方面对运动进行客观的评价。



崔晓麟，女，1966年4月出生，汉族，广西桂林临桂人，现为广西民族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处副处长，学科办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新世纪人才工程”人选。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200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中共党史专业，先后获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江汉论坛》、《学术论坛》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并有多篇论文在全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公开出版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典》、《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著作，曾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序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是各种思想汇集、交流、碰撞的阵地,是培养秉持公正和正义、传承人类文明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孵化场,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的晴雨表。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都进行过艰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探索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思想成果,也积累了挫折的教训。

在中共党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关于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理论 and 政策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进行的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学术研究还比较薄弱,尚未出版一部真正有分量的、有创新意义的学术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一个缺憾。

本书作者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高校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有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专业基础,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目前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仍有相当难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研究选题,显示了其学术勇气和研究魄力。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专著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弥补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之处。

这本专著从中国共产党探索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方面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规律的视角,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首先肯定了195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发动思想改造运动,以巩固新生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要性;以传统的严谨的史学研究方法,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来龙去脉;借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知识,结合丰富的史料,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方式方法及其显著的成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取向、社会心态与人格健康等方面所造成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提出了对新时期处理好与知识分子关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性思考。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目前可直接借鉴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因此,本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是在已有成熟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式研究,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开发处女地的原创式研究,很有开拓性。而且它能够大胆地突破某些传统的看法,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年谱、日记、传记等材料互为印证,认为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划分是:动员学习、“三反”与“洗澡”运动、组织清理与“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

四个阶段,而不是传统所认为的动员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组织清理三个阶段;此外,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知识分子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事件,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和立场的转变影响最大,成效也相当好,所以著者将高校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接受教育,加强思想改造,作为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进行分析,是有一定的创新思想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的。

当然,这本著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尽管著者花费了相当精力广泛收集可能收集到的材料,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历史档案基本上还没有开放,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专著出版后,如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以促进和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件好事。

王顺生

2005年10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前言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历史上大凡政治的革新、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无不活跃着知识分子的身影，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之光。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因此，国家政权能否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能否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但是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却一直都是困扰人们的主话题之一。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博士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①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由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被资本主义国家压迫和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变革而来的必然会出现社会、政治、经济和

^①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新整合。就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而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如何整合新中国成立之初多元并存的思想信仰,确立马克思主义为全民所共识的信仰。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阵地,能否培养出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关键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于是,在整合的主题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高校知识分子,处理好与高校知识分子的关系?怎样整合掌握着话语权的高校知识分子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使其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以贡献新中国等问题就成为执政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此而引出一些具体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主要有什么样的人员构成其主体部分,其政治思想状况如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改造高校知识分子与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思想、旧习惯,并推进高校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给我们在新时期正确地了解和掌握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并有针对性地加强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鉴,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的研究现状

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相关的论著不断问世,学者的研究触角伸到了该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是,目前研究1951年前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学术论著不多,而专门以高校知识分子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的著作目前还是个空白。具体地说：

1. 著作方面：著墨较多，论述较为详细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是于风政的《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

作者是以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全书围绕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这一主线展开。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只是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关于运动的原因和目的，他认为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对运动的成效，于风政认为运动“不是成功的”，且认为这次运动是“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开始^①。于风政对这一运动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重点着墨于“洗澡”运动，描述了教育界、文艺界和科学界知识分子“洗澡”的情景，大量地运用了知识分子的检讨材料。应该承认，于风政的这本著作是目前国内研究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部力作。但他没有专门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内容较为宽泛，而且在史料的运用上，采用了较多的负面材料，较少地结合正面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其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也谈及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探寻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效果，但没有对运动的过程进行梳理和系统的研究。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费正清是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建国初期执政党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就是“要洗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

^① 于风政：《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617、612页。

义的思潮的影响”，以“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他认为其效果是不成功的，因为“党为了其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不受到威胁，同时又要保证正常地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走钢丝。”^①作者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但结论的得出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作者的结论缺乏科学的合理的论证。史景迁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根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下述几种现象：一是过分推崇西方；二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三是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②

总的说来，研究停留在某个侧面，不系统，不全面。

2. 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已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有 10 余篇，主要有蔡达勋、吴彬彬的《建国初期我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回顾》（《党史教学与研究》1990 年第 2 期），刘健清的《试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谢莹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 年第 5 期），刘晓清的《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及原因》（《浙江学刊》1998 年第 5 期），戴鹿鸣的《对〈剑桥中国史〉第二章有关部分的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朱地的《对建国初期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张舒屏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 年 11 期），谢泳的《思想改造》（《南方文坛》1999 年第 5 期），笑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2002 年第 8 期），李巧宁的《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意识》（《社会科学论坛》

①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9、92 页。

②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3—334 页。

2003年第9期)等等。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的原因：谢泳、笑蜀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基本评价这一视角来分析运动发生的原因。认为“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由此得出结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张舒屏认为运动的发动有两方面的因素：从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容易使知识分子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致力于国计民生的恢复，使他们对国家建设树立了信心；抗美援朝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建国初期的政治学习使他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切的影响，使知识分子急欲投身于这样一个新社会中去。从执政党方面来说，是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李巧宁认为，“罪感意识是知识分子产生改造欲望的前提，是他们能在不断地被改造过程中诚心投入的心理基础”。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和特点：一般的学者对运动的过程都停留在非常粗略的梳理和宏观的陈述，限于最基础的研究，不系统也不全面。目前没有发现有学者对运动的过程进行正确的阶段划分。对运动的特点进行系统归纳和论证的也较少。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总体成效的评价：谢泳、笑蜀、张舒屏等学者对运动的积极作用作了简单的肯定之后，主要是从负面的影响来评价这次运动，欠客观。而大多数学者对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对当时中央文件的诠释或翻版，学术性较少。

总之，这些文章多从某一角度或侧面对运动的发动及其原因、

运动的全面展开、运动总体成效的评价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但大都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缺乏系统地全面地深入的研究,学术性不强。

3. 文献资料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中央文献、领袖人物的年谱、文稿和传记等。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刘少奇年谱(1898—1969)》、《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胡乔木文集》、《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等,对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近年来也出版了大量作为运动当事人的年谱、文集、全集、回忆录、传记和一些日记等。如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冯友兰传》,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费孝通传》,季羨林的《朗润琐言》,《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谭其骧日记》,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何兹全的《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等等,对本选题的内容有较详细的记述。不过,这些回忆录或传记大多着墨于高校知识分子受伤害最深的“三反”运动和“洗澡”运动阶段以及受伤害的情形,感情色彩较浓,内容较庞杂。所反映的内容多是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某一侧面,不够全面,容易以偏概全。当然,在许多原始档案未开放的情况下,这些回忆录和日记成为研究本课题的重要材料。

二、核心问题的说明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高校知识分子。而每个研究知识分子

问题的学者大多要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进行一番界定。事实上,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莫衷一是。

根据有关资料,“知识分子”这个词是19世纪60年代由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创造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只是偶尔使用过,他们多是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来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在列宁的著作中,“知识分子”一词才被大量使用。至于什么叫“知识分子”,列宁认为是指那些“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一般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自由职业者(指英格兰人常说的脑力劳动工人)”^①。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根据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应该主要是指那些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在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科研机构、新闻出版等单位从事脑力劳动,以取得工薪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办事员、教员、医生、专家、记者、编辑等。或者说,在旧社会,这部分被称为“职员”的人,是知识分子主要的和基本的队伍。此外,我们也历来把“自由职业者”和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作知识分子看待。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么,本选题的高校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哪些人员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类知识分子有2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5.4亿人的0.37%^②。它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把他们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人数较少,解放后大多成为各级机关的负责人;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各类学校、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八卷,第309页。转引自朱文显,“广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7—24页。

②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20世纪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研究机构、厂矿企业和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占大多数;三是当时还没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在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主要也是指这三部分人。但在本选题里,革命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青年学生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培训成为推动思想改造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而那些从国统区以及从海外归来的教师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这些被重点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党外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因此,本书所研究的“高校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未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校非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教师。

具体而言,从政治倾向和信仰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师分为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三部分。即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为进步分子;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为中间分子;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为落后分子^①。进步分子中有不少的人是高校里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是各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一般来说,进步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较快,他们不是最难改造的对象;中间分子人数较多,占了高校教师中的大多数。这部分人大多不太关心政治,也不反对现任政府,他们追求一种纯技术、纯学术的境界,强调学术有相对的独立性;落后分子是那些在解放前社会地位较高,又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高校教师,他们和中间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因此,该书中又主要以高校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为代表来分析知识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及其感受。

从职业划分来看,高校教师又分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从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地改造思想,以适应新政权新社会的需要。但由于人文社科类的高校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关系较近,其社会影响又远超过科技类的知识分子,其精神产品也更易为社会所关注和理解,因此,人文社科类的高校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而远离意识形态的科技类高校知识分子,由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使之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即使在每个教师都必须“过关”的“三反”运动和“洗澡”运动中,科技类的高校知识分子得到一定的照顾,大多能相对轻松的“过关”。如1952年李富春就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的情况给薄一波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科学院‘三反’情况不坏,对科学人才有教育意义。关于下一步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关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思想反省,“不要勉强非党人士进行反省”。重点检查,主要是检查仪器的购买及科学事业费是否用得恰当,弄清事实,“不追究个人责任,不检讨个人